



华夏文摘增刊
文革博物馆通讯（二六四）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四二九期 ——
(二〇〇五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版)

本期目录 (zk0504d)

【读书札记】大醇小疵之《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余汝信
【往事回首】陈伯达最后八年 (1981—1989)	陈晓农
【历史沉思】重新审视陈伯达	金 钟
【史海钩沉】《红十条》的模糊语言与造反派的互相攻击	欧阳龙门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以纯文本形式投寄 hwxz@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读书札记】

大醇小疵之《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

• 余汝信 •

陈伯达是毛泽东时代中共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家，亦是文化大革命的主要推动者。十年文革期间，陈是众所周知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一跃而成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之后的中共第五号人物，陶铸倒台后，更排名第四，地位显赫。惟在1970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突然被毛抛弃，毛以《我的一点意见》指称：“我跟陈伯达这位天才理论家之间，共事三十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更不去说很好的配合”。此言一出，举国愕然！既然从来没有配合过，何以能成为毛亲自钦点的第五号人物？

陈伯达一生有过三次婚姻。二子陈晓农，为其第二任妻子余文菲所出。近日，由陈晓农编纂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在香港出版（阳光环球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5）。正如该书封底的简介所言，陈晓农“自幼与其父一起生活在中南海。从陈伯达被准许保外就医到去世的八年间，一直与作者朝夕相处。由于此时陈伯达几乎过着与世隔绝的生活，明知自己来日无多，心中的诸多冤屈和不平又无法与外人道，只有儿子可以无话不说。陈晓农又是一个有心人，往往将父子间的交谈引向对历史的回顾，且有意识地将陈伯达的谈话做了笔记。如今陈晓农参照这些笔记，仔细回忆了父亲的谈话，并搜集了相关的史料文献作为佐证，编纂了这部书。由于

是父子交谈，陈伯达没有想到将来会公诸于世，故不必象当今大多数历史著作、传记和回忆录那样需要故意回避许多事与人。因此，本书的出版，对研究毛泽东和中国现代史具有无可替代的价值。”

这些话，应该说是中肯的。

（一）

《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以下简称《陈》），大体上可分为陈氏早年经历至文革前夕和“‘文化大革命’的岁月”两大部分，两者在篇幅上的比例大致为六四开。前一部分最为引人注目之处，当为陈晓农对自己所经历的十五年中南海生活的描述，以及陈氏父子以其独到的视角对中共高层人物的一些观察。

1．对高饶事件有自己看法

高岗、饶漱石事件，是中共建国之初震动朝野的一件大事。从五十年代初事发至今，中共对此事件的官方说词基本没有变化。而据陈晓农说，对于高饶事件，陈伯达晚年有自己的独特看法。

陈伯达称：“高饶事件是解放以后第一次党中央内部的斗争，这件事处理得并不好。因为高岗只是反对刘少奇同志个人，并不反对毛主席。这件事应该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不应该作为敌我矛盾来处理，不应当把反对某一个领导同志当成反党。实际上这件事开了一个不好的先例，从此以后动不动就把党内问题当作敌我问题来处理”。“把高饶的问题作为敌我问题来处理，其历史的效果是不好的。总之，这件事开了一个不好的头。当时如果把高饶的问题作为党内问题处理，就会比较妥当一些。”（《陈》页120—121）

陈伯达又说：“高岗和刘志丹是陕北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对革命是有功劳的。高岗过去打过仗，但他文化不高，实际上只是个草包，不值得把他的问题搞得那样严重。高岗倒了以后，西北的一些同志是有意见的”。（《陈》页120）

说高饶事件将党内矛盾作为敌我矛盾处理，历史效果不好，无疑是对的，但陈说高岗“实际上只是个草包”，则恐怕还是带着有色眼镜看人。高岗应该还是有能力的，只不过斗不过毛罢了。

2．田家英受审查的主要原因

文革风暴到来的前夕，田家英突然受审查并随之自杀身亡。据陈伯达说，田是陈推荐予毛的，中共建国后陈、田一起共事多年，后来关系不甚融洽。本书透露了田家英受审查的主要原因：“六十条的草案在广州会议上通过以后，没有几天，田家英跑来找我，本来他也参加了文件的讨论，可是这时却忽然对我说，六十条搞得不好，应该重新另起草一个文件。我一听就批评他：你这个人才糟糕呢，中央刚刚讨论通过了文件，你怎么就这样说话？我的批评很严厉，他听了很窘促。这就是他跟我发生矛盾的原因。他当时想转移话题，说广州离香港很近，我们要能去香港看看多好呀！我听了觉得很奇怪，问他为什么想去香港。他说他有个哥哥大概现在在香港。我于是问他是怎么回事，他才说他有个哥哥过去曾在中央社工作过。我没有再说话，因为田家英是我推荐给毛主席的，我应对他的政治情况负责，他有这么重要的社会关系，过去却没有告诉我，我当然有意见。这次谈话虽然不愉快，但我觉得事情既然已经过去了，就算了，后来也没有跟毛主席谈起过，回北京后，我有时候去琉璃厂旧书店买书，还是约上他一起去。

直到有一次在北戴河，我去毛主席那里，毛主席很不高兴地对我说，你知道田家英说你什么吗？我愣住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毛主席把江青叫来，对江青说：你把田家英说陈伯达的话跟陈伯达说说。他有意见不跟我当面讲，要去跟江青讲，想通过江青影响毛主席，这就使关系难恢复了。但不管怎样，田家英毕竟是我推荐的，我也不好否定自己的推荐，所以我没有在毛主席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面前议论他。他后来受审查，我事前并不知道，是中央在会上宣布后才知道的。”（《陈》195—196）

田家英文革前夕受审查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中央认为他隐瞒了海外的重要社会关系并与之有联系，以致泄露了党内的重大机密。这样的怀疑是否有事实根据，是否妥当，姑且勿论，惟田受审查，是毛泽东同意的，文革后对此事的处置经过多有不实之词，指责为陈伯达、王力、戚本禹所为，有违事实，有欠公平。

3. 与杨尚昆一直合不来

陈伯达忆及早年在苏联的岁月时，谈到与杨尚昆等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的关系：“我在苏联时，一直是受王明一派打击的。回国以后，他们中间有些人转变了态度。1931到32年，陈原道和殷鉴同我一起被关在国民党的监狱里的时候，他们两人对我很好，诚恳向我表示了歉意。1937年我到延安以后，张闻天也对我很好，对我很关照。但是，杨尚昆却与我一直合不来，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刚解放时，我主持党校的工作。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我向他要办校的经费，他就不肯给，说没有钱。等到我离开党校，杨献珍主持党校，向他借钱时，就很容易要到了。还有，解放初毛主席要我搬到中南海住，当时中南海房子不好找，刘少奇同志说他就要搬到新盖的房子去，他现在的房子可以让给我住。我去跟杨尚昆说了少奇同志的意见，他却说：‘那个房子你不能住！’我只好另找别的地方。可后来，杨尚昆自己去住进了刘少奇原来的房子。总之，别人不能住，他自己却可以住。”（《陈》页20—21）

大概是受了父亲对杨尚昆看法的影响，陈晓农笔下对杨也多有批评。如谈及中南海生活一段，陈晓农借中南海西楼厨师的口说“在这儿吃饭的几家，数杨尚昆家的饭不好做，他们老爱吃西餐大菜！”又称：“杨尚昆爱吃的西餐大菜，我们家从未吃过。杨尚昆及其夫人李伯钊年轻时在苏联居住多年。他们爱吃的是俄式大菜。李伯钊的衣着也保持着苏联人的习惯样式，冬天穿一件裙式大衣，腿上只穿着厚袜子而不穿裤子，在中南海里显得很特殊”。（《陈》页231）

陈晓农还有意识地提及杨受毛“严厉批评”的一件事：“1958年大跃进期间，各地大兴土木，中南海在中央办公厅杨尚昆主任的管辖下，也曾准备大拆大盖。当时，陈伯达闻讯后很生气，曾在家和刘叔宴商议，如果中南海大兴土木，就搬出中南海，并告诉我们兄妹准备搬家。不久，杨尚昆趁毛泽东不在北京的时候，擅自决定把居仁堂（解放后曾作为中央军委的办公处）拆掉了。毛泽东回北京后，一次散步走到居仁堂原址，发现居仁堂不见了，很是生气，严厉批评了杨尚昆，终于制止了杨尚昆在中南海大兴土木的计划”。（《陈》页221）

4. 陈伯达与陆定一：谁比谁更左

以陈伯达在文革中表现而言，一般认为他是中共党内激进的极左派。但陈不同意此说。他认为，党内比他左的人，所在多有，如陆定一。

在谈及1962年广州会议周恩来、陈毅曾说要给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而后却无疾而终的具体原因时，陈伯达说：“那时周恩来同志提出这个问题，认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多数都已经是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不应该再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他提的很好。开始毛主席也没有表示不赞成，但是中央有些人不赞成，主要是陆定一明确表示反对。陆定一

说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变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就是不能摘。他和周恩来争论的很厉害，僵持不下。陆定一当时是中宣部长，主管这方面的事情，中央尊重他的意见，就把这件事放到一边去了”。（《陈》页225—226）

陈晓农就陆定一此事写道：“胡乔木说过：‘历史是不能删改的’。陆定一率先反对周恩来、陈毅为知识分子摘掉资产阶级的帽子，是一件事关中共中央政策走向的重要历史事实。其后，毛泽东从犹豫不决转变为完全接受了陆定一的观点，并对陆定一的观点加以发展，形成了中共中央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知识分子的‘左’的政策。而陆定一本人，也因促成这一政策中的作用，于1964年为加强无产阶级在文化领域的领导权而兼任文化部长，取代被认定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茅盾同志。这种状况为期不长，1965年，发生了陆定一夫人严慰冰写匿名信骂林彪全家的事件，陆定一受此事株连，被中共中央决定立案调查，随后被撤销了所有的职务”（《陈》页228）

不管陈晓农的论断是否正确，以上一段史实上却有一些时间上的误差。陆定一担任文化部长的准确时间是1965年1月，被立案审查是在1966年5月，两者时间上都比陈晓农所言向后推移一年。

5. 陈伯达与薄一波：谁是叛徒

1970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后，陈伯达被指为“国民党反共分子、托派、叛徒、特务”。在口述回忆中，陈伯达对这一连串罪名一一加以驳斥。

有关“叛徒”的罪名，陈晓农写道：“当代中国的政治要人薄一波在近年所写的回忆录说，他在出狱到达延安之后，曾经向刘少奇揭发了陈伯达‘叛变出狱’的问题，可刘少奇却回答说：‘他（指陈伯达）当个秘书还可以吧’。

“按照薄一波的回忆录，刘少奇成了包庇陈伯达的包庇犯。因为刘少奇不仅不将陈伯达开除出党，反而认为他可以担当中央主席毛泽东的秘书。人所共知，中央主席的秘书是一个直接接触党的核心机密的重要职务。中共对于叛徒一向有极严格的纪律处置。……刘少奇既然接到了薄一波的揭发，却不按照党的纪律规定开除陈伯达的党籍，还要安排他当毛泽东的秘书，而薄一波作为中共七大的代表资格审查委员，对于陈伯达当选七大的候补中央委员（随后递补为中央委员），也不采取组织措施加以阻拦，这岂不都是咄咄怪事？薄一波还说他在延安见到陈伯达以后，陈伯达很尴尬。可是据陈伯达本人生前所讲，薄一波当年在延安中央党校听陈伯达讲课，对陈表现得格外亲热。建国初期，他们两人同往天津搞调查时，同住一所房子，彼此亲密无间。而且还有不只一人亲眼见过薄一波在1965年专程到陈伯达家中，与陈伯达亲切交谈。更何况薄一波曾与陈伯达同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朝为官’十余年，经常同堂议事，对这些情况，薄一波又该如何解释呢？”（《陈》页32—33）

文革中有所谓薄一波等“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文革后得以平反。以陈晓农的说法，事实上薄一波等当年是在中共中央同意“履行一个不反共不发表的简单手续”的前提条件下，却发表了《反共启事》出狱的，陈晓农认为，当薄诬指陈伯达是叛徒时，实际上是自己做过的事有点儿心虚。

陈伯达说：“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安子文、薄一波、杨献珍他们平反是应该的。那件事责任不在他们。但是薄一波自己平反了，就说别人是叛徒，这就没有道理了。除了薄一波，其他人好像没有这样。七大时，薄一波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八大时，他的好朋友安子文是代表资格审查委员，安子文又长期担任组织部长。我如果真有问题，他那时说一句话，我能当选吗？他现

在有了权，就可以不讲道理了”。（《陈》页 3 5 0 — 3 5 1）

陈晓农写道：“笔者以为薄一波本不必为这个历史的环节感到心虚，毕竟那时环境复杂多变，难以不出纰漏。他已获平反，无人再议此事，可他偏偏放心不下，以为陈伯达接触情况多，是半个知情者，若不封住其口，心中总是不安。而封住其口的绝好办法，就是继续维持文革中给陈伯达戴上的‘叛徒’帽子。因为在中共历史上，只有把人定为叛徒，才能抹杀他的一切，他所做过的一切有益的工作，他所说的一切话，统统都被视为假的，无人再敢相信。当年薄一波对不服从在‘反共启事’上签字决定的刘格平那样耿耿于怀，恐怕也是出于同样的心病”。（《陈》页 3 5 5）

6. 陈伯达眼中的毛刘、毛林关系

本书似缺乏陈伯达对毛泽东、刘少奇、林彪、周恩来等中共最高层人物的较为系统的单独评价。书中仅有数段谈及毛刘、毛林关系。

有关毛刘关系，陈晓农曾问陈伯达：“毛主席认为刘少奇要搞资本主义。如果刘少奇真的掌权，他也并不会搞资本主义吧？”

陈伯达说：“这个事不好说。少奇同志过去做过许多工作，他有些文章写得也很出色。他过去是反对王明路线的，在和王明路线做斗争时，他和毛主席配合得很好。延安整风以后，少奇同志的地位提高到党内第二位，这与毛主席的信任是分不开的。但是，另一方面，少奇同志的思想有时变化又很大，很突然，令人难以理解。他做事有时也是武断的，别人不容易和他商量问题。可以说，他和毛主席的脾气比较相似。没有在工作上和他接触的人觉得他很温和，实际上不然。

“从他的思想来说，最早一次和毛主席的分歧大概是抗日战争时期他写给续范亭的一封信。续范亭拿给毛主席看了，毛主席当时就在信上批了一些话，表示不同意刘少奇的观点。

“抗日战争结束后，在与国民党和战问题上，毛主席与刘少奇之间意见不同，知道的人不多。少奇同志 1 9 4 9 年在天津的讲话，1 9 5 1 年对待山西省农业合作社的批语，毛主席有过批评意见。但那时的不一致，是党内同志之间的正常现象，毛主席并没有当成大的问题。从总的方面说，毛主席对少奇仍是非常信任的。所以解放后高岗拿少奇的天津讲话攻击少奇，说少奇不执行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当时毛主席是反对高岗的，是保护少奇的。当然，高岗的话可能也给毛主席留下了印象，后来毛主席继续与少奇发生矛盾时，毛主席就把过去的分歧联系了起来。

“刘少奇会不会走资本主义道路，这个问题不好说，历史不能假设。我觉得他更多的可能是继续中苏友好。

“毛主席后来整少奇同志整得过分了，本来应该作为党内矛盾来处理，却错误地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结果造成一个大悲剧”。（《陈》页 2 5 1 — 2 5 2）

陈伯达谈及毛林关系时说：“毛主席还谈到了红军初期的一件事。有一回，上海的党中央发来电报，要毛主席和朱德两人离开红军，担任其他工作。毛主席心里很不愿意，但是准备服从中央的决定。这时林彪找到毛主席，劝毛主席不要服从中央的决定。后来毛主席接受了林彪的这个意见，没有离开红军。毛主席跟我谈到这件事，说明他那时对林彪印象很好。

“抗战中期，林彪从苏联回国后，有一回大家在一起聚会，有人说，将来中国会和苏联一样好。林彪说，将来中国会比苏联更好。毛主席很惊奇说，是这样么？林彪说，中国肯定会超过苏联的。其实，林彪这话是我跟他谈论苏联情况时，我先说过的。记得林彪和叶群结婚摆酒席时，毛主席也去了。毛主席一般是不参加别人的婚礼的。解放后，有一段时间，林彪住在苏州。有一次毛主席到上海，曾要我陪他一起到苏州看林彪。总之，过去毛主席和林彪的关系是很好的。”（《陈》页67—68）

（二）

陈伯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是毛泽东发动和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领军人物。文革部分，本应是《陈》一书的重头戏。遗憾的是，这部分仅占了全书约百分之四十的篇幅，且相当一部分叙述是整段整段地引用了别人的材料或陈晓农自己的评论，与该书文革前部分相比较，陈伯达本人的回忆，陈伯达自己的原话，就更显得份量少且单薄了些。惟本文标题中所谓的“小疵”，并非针对陈伯达回忆的份量多少或正确与否，主要者，是指陈晓农评述文革中陈伯达与“华北问题”关系时有关军队的这一部分。

1. 38军与保定问题

陈晓农说：“1966年，毛泽东为加强安全力量，调三十八军入关进驻保定。听石家庄的群众说，由于三十八军原不属于北京军区管辖，自恃有特殊背景，在军力上又是一个机械化加强军，相当于两个军的实力，所以不把北京军区放在眼里，在文革中，它和北京军区原所辖各军的关系都不融洽，在保定更与河北省军区严重对立”。（《陈》页334）

关于38军与保定问题，笔者在去年2月间曾发表过《文革旋涡中的38军》一文（首发于电子刊物《枫华园》，见本刊zk0406e—编者）。人微言轻，似乎未能引起学界更多注意。为此笔者乐意就陈晓农上述说法的误区，重复一下拙文的一些主要观点。

首先，38军移防到保定的时间，并不是陈晓农所说的1966年，而是1967年2月。

38军以后编写的军史称：“奉毛泽东主席和中央军委的命令，第38军于1967年2月18日开始由吉林省通化地区乘火车移防河北省保定地区。军的部分主要领导于2月15日乘飞机先期到达”。“2月15日4时许，第38军受领移防预先号令，16日零时15分受领沈阳军区转北京军区‘部署调整’电令，18日19时12分先头部队——第334团1营乘火车离开通化”。（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编审委员会：《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北京：解放军文艺出版社，1993，页616）

陈晓农所说“在军力上又是一个机械化加强军，相当于两个军的实力”也不对。38军1967年2月移防保定时，辖三个陆军师及军直炮兵团、高炮团各一，远无“相当于两个军的实力”。38军组编为“摩托化军”，是在1969年，“遵照北京军区1969年3月3日司务字第9015号通知转中央军委1969年2月24日示：经毛泽东主席批准，决定将第38军组编为摩托化军。编成：军辖三个摩托化师和炮兵团、火箭炮团、高射炮团各一个。要求全部组编工作于1970年完成”（《陆军第三十八集团军军史》，页621—622）。这已是移防两年后的事，保定问题亦基本平息。此外重要的是，“摩托化”并不等同于“机械化”，前者距后者还有相当距离。

至于38军与北京军区、河北省军区关系紧张，责任不能全推到38军头上，仅指责38军，并不公允。事实上是38军受压在先，反弹在后，正如笔者在《文革旋涡中的38军》所

言：“介入保定地区支左之初，38军尚无一定之见。自1967年4月以后，以‘八一总部’平反与否为导火线，保定造反派组织重新洗牌，组合成‘工总派’（即‘农大造反团派’）和‘工筹派’（即‘革命红楼派’）两大派系，较稳健、保守的‘工筹派’得到省军区的支持，受省军区排斥的较为激进的‘工总派’，主动对新来乍到的38军示好，寻求支持，38军与河北原当权势力无任何牵连，在感情上亦倾向于‘工总派’，与‘工总派’一拍即合。

“38军与省军区（当时称保定‘两军’）在支持谁的问题上各持己见，渐行渐远，裂痕加深，终致水火不相容。与省军区荣辱与共的北京军区，对38军颇有微词。保定两派也各恃有军队方面支持，冲突四起，武斗不断”。

陈晓农认为38军“自恃有特殊背景”，又说：“河北很多人都认为你（笔者：陈伯达）和林彪是对立的，因为三十八军和林彪关系很特殊，是林彪的嫡系”（《陈》页333）。笔者在《文革漩涡中的38军》中已论述过，38军虽曾是四野的部队，但算不上是什么林彪嫡系，笔者在文中还驳斥过那些所谓38军与林彪关系密切的传说：“对38军，对北京军区各军的矛盾，林彪其实十分注意避嫌，从不表态，根据目前已知的材料，自38军调至保定，林彪从未到过该军，从未召见过该军的任何干部，该军负责人，亦从未单独见过林彪。这也是‘九·一三事件’后38军各负责人能安然摆脱干系的重要原因”。

38军对陈伯达有所不满，并不是因为与林彪的关系。原因如笔者在《文革漩涡中的38军》所述：“1967年12月至翌年1月间，陈伯达在北京军区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李雪峰等陪同下到河北各地视察，为省革委会的成立清除障碍。时驻河北各军、省军区倾向于各地较保守一派，唯独38军支持激进派，陈等急于稳定局势，在保定等地的讲话中，未免站在北京军区立场，对38军支持的一派作了严厉批评”。38军当时有冤无处诉，因为有这样的前因，“1970年8月，在庐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翻车，李雪峰、郑维山均受牵连。12月10日，38军党委报告军委办事组并中共中央，‘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罪行’。38军党委的报告，意在借批陈一吐自调防华北后所受的鸟气，今天看来，报告一如当时的众多揭发批判材料，不乏牵强附会、言过其实之词。惟毛泽东正愁没有攻陈的炮弹，38军报告正中下怀”。恩怨怨，是是非非，来龙去脉，不外如是。

2. 27、28两军移防的原因

陈晓农说：“1970年初，倒陈的步伐加快。中央以加强备战为由，在华北进行军事大调动。这次调动似非单纯的军事行动。调动的关键之点是郑维山曾任军长的六十三军从石家庄调到太原，另调原驻无锡的二十七军，北上进驻石家庄。原驻太原的六十九军调至大同。从纯军事角度讲，如果山西军力需要增强，可直接将二十七军调至大同。可节省大量财力、物力和时间。可是中央却舍易从难，实施几个野战军的连环大搬家，大换防。这显然含有政治原因，因为陈伯达同北京军区以及六十三军关系良好，而石家庄的军民观点又比较一致。毛泽东吸取了武汉“七·二〇”事件的教训，要避免在倒陈时出现麻烦。另外，增调原叶飞所部二十八军至晋南，也非偶然。叶飞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是指责陈伯达为彭德怀同类的主要人物，倒陈一旦展开，二十八军与二十七军即可协同三十八军，共同应对可能出现的新问题。可以说，这次调动是向北京军区掺沙子的重大步骤”。（《陈》页336）

以上一段关于两军移防问题的评述，时间上有误，移防部署、意图的推断有误，将其与“倒陈”联系起来，更是大误特误。

两军调往华北，缘于当时中苏关系的紧张。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之后，6月20日至7月4日，军委办事组在北京召开“三北”地区作战会议，研究了防止苏军突然袭击的

作战思想准备、作战设想、部署调整和边防斗争等问题。8月16日，北京军区召开作战会议。会议由军区司令员郑维山、政委陈先瑞主持，会议传达了“三北”地区作战会议和全军作战会议精神，结合军区实际研究了设防、部署调整等问题。10月16日，经毛泽东批准，军委向有关军区和空军下达了建立全军战略预备队的命令。11月24日到29日，经中央政治局批准，北京军区在北京召开华北地区第一次战备工作会议，会议由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主持。

基于以上背景原因，1969年8月20日，军委电令，调陆军第27军（率第79、80师）进驻河北省张家口、宣化地区，归北京军区建制，协同其他部队“抗击敌人可能沿二连、张家口向北京发动的突然袭击”（该军第81师1969年11月由镇江移防河北邯郸）。至1970年3月，27军作为全军总预备队，方再移防石家庄、邢台地区。（《陆军第二十七集团军军史》，1999，页423—424）。同年11月，陆军第28军列入全军总预备队。11月17日，奉命移防山西（《陆军第二十八军军史》，1985，页267）。

北京军区其他几个军，同时在1969年下半年移防。10月21日，军委令原驻河北唐山地区的陆军第24军移防承德地区；10月28日，军委令陆军第63军从河北移防山西；11月，陆军第69军军部从山西太原移驻大同，原驻大同的该军第28师（已改称205师）从大同移防内蒙古集宁地区。

为什么不将27军直接调往大同？陈晓农有所不知。在大同本来就有69军的28师，69军军部及28师再向北移在当时是顺理成章的事。另当时27军是作为战略预备队使用，与28军同在石家庄、临汾一线倒是合适的。再有就是陈晓农说28军是叶飞旧部如何如何，要知道那年头叶飞早被打倒，能将28军的移防与叶飞—陈伯达—1959年的庐山会议联系起来，如此想象力，也过于丰富了。

综上所述，27、28两军与北京军区其他三个军的移防（另38、65、66军原部署基本未动），确为军事调整部署，基本态势是防止北方外敌突袭，无涉国内“政治原因”。移防发生于1969年下半年，而不是“1970年初”，时间距1970年8—9月间庐山九届二中全会足有大半年（如从27军移防算起更是整整一年）。移防工作是由郑维山参与主持的，并不主要针对63军，华北几个军都有移防。当时并无所谓“倒陈”的问题，毛泽东如何神通广大，也不可能预知到一年后发生的事而要去“避免在倒陈时出现麻烦”，况且，毛泽东真要对付陈伯达一介书生，调两个警卫班足矣，何至于要调动两个军？

□ 2005年3月

~~~~~

## 【往事回首】

陈伯达最后八年（1981—1989）

• 陈晓农 •

陈伯达生命的最后八年，是在笔者陪伴下度过的，其中，有七年处于保外就医的状况。这段时期，他在权力部门的安排下，蜗居危楼，远离尘嚣，可生活中仍有一些波澜。对这一段历史，本书亦应有所交代。为避免书的篇幅拉得过长，笔者暂以陈晚年的写作情况为主，略作陈述，是为尾篇。

◇ 历史决议把他和四人帮加以区别



记得一九八八年夏天，香港一家刊物在一篇文章中披露，陈伯达曾在内地刊物上发表过文章。为此，引起过某些读者的疑问。

一个从一九七〇年起就被打翻在地，关进囚牢，长期受官方文件和报刊批判辱骂不止，十几年后也不过是保外囚徒身份的人，竟在刊物上发表了文章，这在中国内地似乎是件破天荒的事，这其中的原委究竟如何呢？

事情先要追溯到一九八一年六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通过。这篇决议有关“文化大革命”的部份在提到“中央文革小组”时，点了林彪、江青、康生、张春桥的名字，却没有点陈伯达的名字。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在清理了大量文革时的档案并进行了许多调查后，鉴于了解到的许多过去不为人知的情况，所做的一个决定，即不在这份正式的历史性文件中对陈进行评价。

历史问题决议通过后不久，七月十五日上午，中央委派两位工作人员到公安部管辖的复兴医院犯人病房探视了陈伯达，向他口头传达了中央精神，其大意是：“这几年陈写的东西有些是好的，有些是为自己辩解的，以后不要再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了。对于文革中的事情，有些他是知道的，但多数他是不知道的，这些情况中央是了解的。他过去也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与那几个人是不同的。现在先找个地方住下来治病，治好病不再回去。”

半个月后的一天，恰是白乐天《苦热》诗：“头痛汗盈巾，连宵复达晨”的时节，笔者正在石家庄制药厂针剂车间挥汗做工，厂传达室转来一封北京来信。信中转述了中央的精神和我父亲的近况，希望我尽早到京商量父亲的治疗问题。读罢信，我对家事稍作安排，向工厂请好假，并开具了探监的介绍信，随即搭车北上。

探监在当时实非一件易事。我第一次探监是在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在此之前，有九年多的时间我对父亲的下落一无所知，用工厂同事的话说：是“生死不明”。第二次探监是一九八〇年五月初，第三次是父亲判刑之后不久，即一九八一年三月。几次探监，其间种种详情，在此不能备述。这一次该是第四次探监了。

我于八月五日到达北京，八月六日一早就赶到了复兴医院，监管干部却告诉我，陈伯达已于昨日出去了，现在住进一家大医院，已不归他们管了，归北京市公安局管。我当即按照他们给的电话号码与北京市公安局王申科长取得了联系，随后按他的指点到北京友谊医院做了探视。

父亲住在友谊医院干部病房二楼顶西头一间，房子不大但很洁净凉爽，通走廊处有带浴盆的卫生间，下午定时供应热水。父亲自病后已几年没洗过澡，现在有了条件，就痛快地洗了个澡。总之，无论是居住条件，还是伙食，与复兴医院的犯人病房比起来，差别是非常明显的。当时公安局安排科员萧清河和一位姓赵的同志轮流照顾他。

#### ◇ 八一年底开始照料父亲

在我探视陈伯达期间，公安局王申科长与我商议了治疗、护理等事项，至于以后怎样安排，一时还定不下来。几天后，我又回到石家庄上班。

医院本非久住之地。两个月后，友谊医院就催陈伯达出院。陈家早已没有了住处，家庭成员都四散各地，公安局只得寻找一新的安家处所，考虑到陈伯达腰腿有病，开始还想找平房，但平房实不易找，当时已经天寒，而有暖气的平房更不易找，几经周折，最后还是把家安在东郊新居民区一幢六层楼的顶层。

根据中央的有关条文，在征得我母亲余文菲（已于一九四八年与父亲离婚）的赞同并对她的生活作了安排之后，一九八一年底我离开了已做工十四年的工厂，告别了在我极端困难时曾给予我生活勇气和诸多帮助的同车间工友，携妻带子，迁来北京，照料已是风烛残年的父亲。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我同陈伯达以前的秘书王保春、王文耀一起，由公安局王申、萧清河等人陪同，乘一辆面包车，到中南海西苑门内中央警卫局一库房领取了上面发还的陈伯达的衣服被褥等生活用品。这些东西有些还能凑合着用，有些则已破损不堪，只能当废品卖掉。

衣物中除了夹有两本袖珍本《毛泽东选集》和几册《毛主席语录》外，陈伯达过去花费大部份工资和稿费（陈只使用建国初期的稿费，一九五八年以后的稿费都已捐给科学院图书馆）购买的书籍却一本也没有。陈平生购买的书籍，以学术书为主，古籍碑帖也较多。碑帖为当世所轻，虽称文物，却少有问津者，陈惧碑学衰亡，故留心搜集。字画等物陈也少量买过一些。统共算来，陈的文物与他昔日学生田家英的一千五百多件真伪藏品相比，无论数量或价值，都只是田的零头。陈伯达保外就医后，每天都要读书写作，由于过去的书籍去向不明，书的来源就成了一个问题。他先托熟悉的同志从有关部门借了一部份书，又从当时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中节省近三分之一出来，用于重新购书并订阅一些报刊。直到一九八三年二月，他的生活费增加为每月二百元，购书用钱始觉稍宽松一些。

#### ◇ 出狱后的写作情况

陈伯达保外以后写作的文稿，研究经济问题的部份占有较大的比例。他最初写的供有关部门研究的建议，大致有三个方面：一是引用大量材料论证在迅速发展的世界新技术潮流中，电子技术起着举足轻重的主导性的作用，其发展水平的高低不仅对各个工业领域的技术水平而且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化水平都具有全局性影响，建议国家对此予以充分重视，加速发展和普及电子技术，改造原有企业的陈旧技术；二是建议缩短工时，将八小时工作制改为六小时，或每周工作六天改为工作五天，这样做的好处不仅是提高工作效率、增加工人休息时间、扩大社会就业面，而且主要是可为提高工人的文化技术水平提供必要的学习时间，以适应工业新技术的发展；三是建议发展中小城市和乡镇企业（当时是叫社队企业），限制大城市的过度膨胀，缩小工农差别，减少工业污染。

在哲学方面，陈伯达一九八二年写了《黑格尔反对绝对化》、《科学·假设·实践》、《认识的渐变和突变——从〈坛经〉看中国佛学上的顿渐两派》和批判四人帮以儒法斗争解释中国历史的《儒法两家“其实是兄弟”（评四人帮杂记）》。另外，他还写了些文学评论文章，最初的几篇是《〈石头记〉里的一段公案》、《读〈儒林外史〉杂记》、《求知难——记读〈西游记〉》等。

陈伯达在保外就医的初期，有一条与胡耀邦为总书记的中央书记处联系的渠道。他写作的文稿被直接送交胡耀邦、胡乔木和书记处政治研究室。胡耀邦曾多次对他的写作有过具体的指示，例如胡耀邦曾提出：“陈伯达不要老写读书笔记了，可以就中国近代历史中一些重大的问题，写些可以对后代起教育作用的东西。”但陈伯达认为当时研究经济问题更迫切，就没有及时采纳这一建议。陈伯达在一九八三年六月写的《同痛苦转变进行搏斗》一文的篇首，借用西班牙人士的话，强调提出：“出路在于革新。不革新则灭亡。”开宗明义地点明了经济问题的迫切性。陈伯达写读书笔记，是想借他人的话来表达自己的意见，因为他明白自己只是个犯人，人微言轻。

陈伯达还对一些朋友提出希望他写点回忆录，以澄清一些是非的建议，表示不以为然。他说：“有比写回忆录更重要的事。东隅已逝，桑榆非晚。我不想浪费时间，也不能不顾大局。有许多事，我自己一人吞下了就是了，应当关心的，不是个人的名誉，而是国家今后的发展。”

由于各种复杂的原因，陈伯达与中央联系的渠道在一九八四年夏季以后不复存在。

#### ◇ 和周扬长谈四小时

一九八一年下半年，中央对陈伯达实行与四人帮有区别的政策落实情况，曾在高层领导阅读的内部简报上通报过。作为实行这一政策的推动者之一的周扬，对陈的情况十分关注。众所周知，周扬是文革时最早被打倒、受冲击最大的人，而陈也曾在公众场合讲过批判周扬的话。为甚么周扬会力主对陈实行有区别的政策呢？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历史档案可能不再封存，许多被一时的表面现象所遮蔽的真相有可能昭示于世，到时人们将会理解的。在此，笔者只谈史实，而不加以解释。

尽管实行了有区别的政策，陈伯达晚年仍基本处于与外界隔绝或半隔绝的状况。凡要求与他相见的人都要经过公安部门的批准。只有两位他过去的秘书——王保春和王文耀获准可以经常探望，而王文耀在五十年代曾在周扬处工作过，与周很熟悉。

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二日，记得是个星期四，离五一劳动节放假只有一周了，王保春和王文耀于傍晚时分来探望陈伯达。王文耀谈到，他最近刚去看过周扬，周扬说愿与陈见见面，但周本人并不方便提这个问题。便由陈伯达向他提出：希望见见周扬，请公安局向上级请示，如果允许相见，见面的时间、地点请公安局安排。当天公安局方面答复说：经过请示联系，同意相见，当晚七点在周扬家里见面。

这一天，即一九八二年四月二十三日，星期五，在陈伯达晚年的清冷生活中，无疑是重要的一天。傍晚六点半左右由公安局萧键和老岳两人陪同，乘坐警员高英魁驾驶的轿车前往西单西绒线胡同附近周扬家中赴约。

按照公安人员的意见，我未能陪同父亲前去，只好坐在家中静等。原估计谈两个多小时也就差不多了，因为周陈两位都已上了年纪，谈话过久会很疲劳。但时间过了十点，外面已是夜深人静，却仍不见父亲回来，我不免有些着急。一直等到晚上十一点一刻，父亲才终于回来，因时间已太晚，父亲没能多谈就休息了。

第二天早上，父亲起床比平时稍晚，吃完早餐，他跟我讲了与周扬晤谈的详情。他说，周扬住的地方原是黄炎培先生的旧宅，是个比较大的四合院；晤谈是在会客室进行的，参加的共有四个人，除了他和周扬外，还有周扬的夫人苏灵扬和周扬的秘书谭小邢；同去的公安人员没有在场，他们在另一间房子休息。

陈伯达向我讲述的他与周扬谈话的内容，我曾简要记下一些。

陈伯达对周扬谈到做中央文革小组组长时说，周总理找我谈话三次，要我当组长，我都拒绝了。最后周总理说：“你是共产党员，难道中央不能安排你的工作吗？”他这样说，我无法再推辞，只好当了。至于排第四位，开始调整常委的名单就是把我排在周总理后面，我不同意，找到主席，说无论如何不能把我排在那样前面。主席拿起笔来把排在最后一位的陶铸同志的名字勾到我的名字前面，对我说：“你看这样行了吧？”打倒陶铸同志是后来的事。

对于监狱中有所优待，陈伯达说，我自己以为优待我是因为我在阜平时救过毛主席。四八年春天国民党飞机轰炸阜平，那天早上我听到飞机响，赶紧跑到毛主席那里，他正在犹豫，我说飞机就在头顶上，要赶快走。他听我一说，就走了。他绕过一道墙，听警卫员说我还未走，

回头喊了我。我催他快走。看到他已走到安全地方，我赶快离开，刚跑到院子外，炸弹就已经投下来了，正好炸在院子当中，房子玻璃全被弹片打碎了。如果晚走一步是很危险的。这件事本来从没有对别人说过。七一年逮捕我，我在监狱门口不肯进去，大声说过：“我救过毛主席！”开始关我的地方条件很差，大概我说的话传上去了，几天后把我转到一个三层楼上，生活很优待……。

陈伯达告诉周扬：“我垮台主要是因为和江青发生冲突，在庐山我还和周总理谈到过：江青曾几次想离开主席。……我没有提过林彪当国家主席，我只提过请毛主席当国家主席。”

#### ◇ 十多年第一次春游香山

五一节过后，市公安局安排了陈伯达十多年来的第一次春游，这使他在长期与世隔绝之后，有了一次重新置身于稠人广众之中的机会。春游的地点是北京西郊香山。但令我和父亲都感到缺憾的是，公安局没有让我陪他一起去。从此我也明白了，除了陪父亲去医院治病外，他的外出性活动，我都是不能参加的。

尽管如此，陈伯达春游时的兴致还是很高的。那天恰好气温宜人，天空薄云舒卷，郊外惠风和畅。公安局的萧清河讲到，老人边走边歇地爬上了香山“鬼见愁”的半山腰，途中还遇到一位热心的游客过来闲聊，当游客听说他已经七十八岁了，还竖起大拇指以示称赞。

总之，一九八二年是陈伯达自倒台以来情绪最好的一年，也是他写作精力最旺盛的一年，几乎平均不到一个月就有一篇文稿完成。他的几篇涉及文学问题的稿子亦如愿被送交周扬阅读——这些我们都是事后才知道的。

光阴荏苒，转眼已是初冬。记得是十一月的一天，王保春和王文耀又来探望陈伯达。他们刚刚落座，尚未寒暄，王文耀即从提包里抽出一本三十二开本的印刷品，递给了陈。原来这是一本十月十日出版的当年第十期《读书》杂志，里面刊登了陈五月二十二日写就的一篇文章，题目是《求知难》，原文的副标题“记读《西游记》”没有印出，作者署名“纪训”，这个笔名倒是原来就写在稿子上的。

须要说明的是，陈伯达在保外期间所写的文学、哲学类学术文稿，仍保持自二、三十年代以来形成的写作习惯，差不多每篇写好的文章都要署上一个笔名，还有一件值得一提的事。一九八三年七月，中共中央出版了《邓小平文选1975—1982》（第二版时改称《邓小平文选》第二卷）。该文选有篇重要文章《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是邓小平一九七七年七月二十一日在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上的讲话。邓小平讲话稿中有一句的原文是：“林彪、‘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陈伯达、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讲话稿在收入《邓小平文选》时，这句话改为：“‘四人帮’，特别是所谓理论家张春桥，歪曲、篡改毛泽东思想。”明眼人一看便知，此话改写，是为了删掉陈伯达的名字。这是当时中共中央和邓小平同志贯彻历史问题的决议，不在正式文件中点陈名字的一个明证。遗憾的是，这种对历史问题决议的认真态度并没有持续多久。

陈伯达曾谈到，在狱中写不涉及现时政治的学术文章而得到发表，在世界很多国家并不鲜见；解放前陈独秀被国民党政府判了刑，当然也是被剥夺了公民权的，陈独秀在狱中写的《实庵字说》、《老子考略》等文就曾在《东方杂志》发表。

#### ◇ 周扬八三年挨批再次会面告吹

一九八三年九月初，一夜寒风过后，陈伯达腿疼骤然加剧，一时几乎完全不能走路，无奈，只得向公安局请求联系住院。那时联系住院，须层层报批，手续繁杂，往往要等候很多日子。陈伯达感到身体日衰，想趁等候的时间与周扬再次晤谈，即请求公安局给予安排。几天后，公安局答复：周扬同意见面，但现在医院也联系好了，他们的意见是先治病，待出院后再与周相见。陈伯达同意了。

很快，陈伯达被安排住进了位于北郊的解放军二六二医院。

十月下旬，报上开始点名批评周扬在五月份发表的有关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讲话。在此之前，虽然理论界对这个问题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基本是在学术范围内以讨论的方式进行争论的，而现在上纲为否定社会主义。

陈伯达感到很突然，他想到周扬的为难处境，他甚至怀疑是不是由于他与周扬的来往而连累了周扬，于是托人捎口信给周扬：为避免给周带来困难，建议将再次见面的时间无限期推移。周扬表示同意。

半个多月后父亲出院了，但不久周扬就病倒了。

一九八四年秋，陈伯达本人也因薄一波在大连突如其来的讲话带来的冲击，健康状况变坏，住进卫戍区二九二医院。从此，周、陈两人都处于新的困境之中。虽然困境的性质和程度并不相同，虽然他们此时的地位毕竟极为悬殊，但他们似乎忘了这些，仍常托人互致问候。

当陈伯达得知周扬已基本处于长期昏迷状态时，他很难过，特地托与周扬相熟的王文耀向苏灵扬转达他的关切。苏灵扬心情很不平静地说：“他自己也很困难，还来关心我们。前几年不是情况好一些吗？怎么现在又变成这样？”在场的人都对出尔反尔的现象说了几句牢骚话。

陈伯达曾对我谈到：“陈独秀被审判时，他早年留日时的同学章士钊出庭为他辩护，章士钊在当时名声很大，敢于为国民党的敌人陈独秀辩护，是很不容易的。后来陈独秀坐牢，胡适等还到狱中看他。现在革命胜利了，一个人一旦有事，大家就都六亲不认，这个风气实在不好。所以，我们要感谢周扬，还有几位发表我的文章的同志。”岁月留给陈伯达与周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 ◇ 八八年于桑主持刑满释放仪式

一九八八年九月二十七日，陈伯达因前列腺肥大急性尿潴留住进朝阳医院治疗，十月中旬，医院因保守疗法无效，决定手术治疗。正在手术的准备过程中，陈伯达服刑十八年期满的日子——十月十七日到了，公安部决定在病房内举行一个简单的释放仪式。

十月十七日上午，陈伯达在单人病房里吃罢早饭，坐在沙发上等候。另一沙发空着，留给公安部的领导。我坐到沙发对面的病床上。

八点多钟，走廊里传来了许多人走动的声音，但他们没有进病房，都走进斜对面一间空着的屋子去了。曲大夫进来照例查了病房，说：“他们好像已经来了，别着急，得等一会儿。”

过了半个多小时，不见动静。陈伯达有些不耐烦，说：“我都八十五岁了，人都关到这个时候，不知道还要搞甚么名堂，实在没有甚么意思。”我劝慰了他几句。

又过了一会儿，进来几个穿便服的年轻人，要支录像机。因屋子太小，选支放点很费事，最后不得不把输液架挪走，才在床脚前支放好了。我对其中一人说：“能不能请他们快一些来，老人的病不轻，这样老等着，他精力坚持不了。”年轻人犹豫了一下，答应去催一催。

九点四十分左右，一位瘦高个子的公安部领导人在萧键和医院王浩书记的陪同下姗姗来迟。还有几个不认识的人，每人搬把椅子，一起跟了过来。

病房内不到十平方米。除那位领导坐在沙发外，其他人都排坐在木椅上，有的人只好坐到敞开的门外面。

一位刚才来过的年轻人站在我旁边，拿起照相机对着老人要照相，老人连连摆手：“不要照相！不要照相！都快死的人了，有甚么好照的！”年轻人有些尴尬，但还是趁老人不注意时照了两张。那个录像机没有声音，老人倒没在意。

萧键先说了一句：“这位是公安部于副部长（过了很久我才知道他就是自中共九大之后连任多届中共中央委员的于桑），请他讲话。”

于副部长面对陈伯达开了腔：“今天嘛，你的十八年刑期就满了，以后我们就不管你了。把你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馆，由他们负责了。还有个附加刑五年，也都由下面的单位去执行了。生活待遇不变，考虑到物价因素，再加五十元，每月二百五十元。怎么样，老陈，有甚么要说的？”

“附加刑五年”几个字说得很重，“释放”一词却不曾言及。

于副部长话音一落，陈伯达的话脱口而出：“刚才你说甚么？还要加刑五年是吧？我说，再加刑八年、十年、一百年，都可以，随便加多少！”

于副部长有点尴尬：“老陈，今天应该是你高兴的日子。”

陈伯达道：“我今年八十五岁了，又得了这样的病，已经是快要死的人了，有甚么可高兴的？还要搞五年，我是不可能再活五年的。”

萧键一看谈话陷入僵局，不知如何是好，手里摆弄着一张释放证明。我问了句：“写的甚么？”萧键说：“嗨，甚么也没有。”我接过来一看，上面确实只写着释放日期，并没有提到附加刑，看来于副部长是故意要强调一下附加刑的，他丝毫不考虑一个垂暮老人的心境。这个老人无疑是当时中国最年迈的犯人。

◇ 我是一只蚂蚁谁踩都可以

陈伯达瞥了一眼释放证明，抬起了头，凝重地说道：

“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经历了多少艰难曲折呀！我个人是很渺小的人，怎么处理都没有关系。我不过是一只蚂蚁，谁要踩都可以，甚么时候踩死都可以，没有关系，听天由命就是了。”

于副部长道：“不是讲唯物主义嘛，怎么你还相信天，相信命？”

陈伯达抬起右手向上一指，答道：“天就是党。听天由命就是听党由命。”

于副部长：“哦，是听党由命。”

陈伯达略喘了口气，又说道：“我只说一件事。一九四八年在阜平的时候，国民党飞机来轰炸，我听到飞机响，拼命跑，拼命跑。到了毛主席那里，跟他说，飞机就在头顶，要赶快走，赶快走。我看着毛主席他们走到安全的地方，才离开。飞机炸弹劈劈啪啪落了下来……”

我听到这里，心头一酸，实在忍受不住，失声大哭了起来。

室内一片肃穆的气氛，持续了好几分钟。

我擦乾眼泪，说了两句希望。

萧键谈了将陈伯达安排到北京市文史馆的情况，并站起来介绍了北京市文史馆的书记兼副馆长徐世正、办公室主任范国慧等。

徐世正代表文史馆讲了简短的话。

仪式结束后，公安局搞录像的两个工作人员过来和我握手，一边说：“对不起，我们不了解情况。”

#### ◇ 悄悄处理的遗体告别

时间进入了一九八九年。

“何堪老泪交流日，多是秋风摇落时。”

一九八九年七月三十一日，周扬同志与世长辞。八月，陈伯达用已不听使唤的手写下了挽词：“创延安鲁艺，育一代桃李。悼念周扬同志仲晦一九八九年八月”。周扬亲属收到挽词后，立刻写了回信。

一个多月后的九月二十日，陈伯达溘然离世，领导部门通知：后事悄悄处理。仍有数十位了解陈伯达的人闻讯后自动赶赴殡仪馆向遗体告别。在哀乐声中，人们悲恸的泪水夺眶而出，巨大的哭泣之声惊动了室外过往的人们。据说，这种场景是近些年很少有的。而几位从家乡专程赴京的亲戚因北京正在戒严，在天津遇阻，只得半途返回。

北京市文史馆的书记、副馆长、办公室人员，北京市公安局的几位干部，朝阳医院的医生，中新社和香港大公报的记者，也参加了陈伯达的遗体告别。北京市文史馆作为唯一的官方机构，送了花圈。

#### ◇ 感念胡耀邦对父亲的尊重

如今，参加过向陈伯达遗体告别的老人中，有好几位已先后辞世了。他们当中有史立德、张楠、王拓、洪禹、叶茵、姚黎民、史凤歧等，前三位曾是三十年代北平中国大学的学生，一二九运动的老战士；后几位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加革命的老干部。他们不顾年高体弱，不避时忌，自动赶来参加陈伯达的遗体告别，实际上是代表了许许多多不知道陈伯达死讯的陈的学生和故友的心愿。

行文至此，还有一个人物是不能不提到的，那就是胡耀邦同志。从前文述及的胡耀邦对陈伯达的写作所提的建议，可以看出，他对陈伯达不仅没有像某些人那样采取一笔抹煞甚或辱骂的态度，而且他对陈的人格是尊重的。正像一位朋友向我谈论的：胡耀邦是一位在陈伯达已被推入绝境后仍把陈当人看的高级领导人，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他实事求是的勇气。是的，胡耀邦跟陈伯达过去并无深交，除了在五十年代时毛泽东曾吩咐陈帮助他拟定青年团的文件外，两人几乎没有甚么来往。胡耀邦是从他直接接触的档案材料中，从陈伯达曾为中共及其领袖艰难服务数十年的基本事实中，感觉到批陈运动中的那一套说法是荒谬而不合情理的。

早在七十年代末，胡耀邦任中央组织部长时，即在一次谈话中对给陈伯达戴上无数帽子的作法表示了反感。一九七九年十月，他根据新了解到的事实，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讲话中第一次果断地停止点陈的名字，而在原来习惯点陈的地方换上了康生的名字。一九八一年陈伯达保外就医以后，正是在他的指示下，使陈的生活与医疗得到较为周到的安排，给陈的写作创造了一个较好的环境。在百忙之中，胡耀邦不仅对陈伯达的每篇文稿都亲自过目，而且曾亲笔批示，要求中央书记处的有关人员关心陈伯达的写作，在一九八三年那时的历史条件下，陈伯达那篇谈哲学史的文章如没有他的首肯，也是不可能得以发表的。

令人想不到的是，一九八六年，薄一波突然向中共中央报送了《关于中央一级生活会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的报告》，全面指摘胡耀邦的工作，并将该文件传达到全国各级党组织，迫使胡耀邦离开了领导岗位。

一九八九年四月十七日，胡耀邦同志不幸逝世。

◇ 时光似流水，往事如烟霭。

在此，笔者谨向曾在极其复杂的条件下对我父亲给予诸多关照的胡耀邦、周扬等同志的英灵表达深切的感念之情。到今年，他们已去世十五周年了。

笔者并向所有关心或帮助过我父亲的相识或不相识的人们表达我诚挚的谢意！向北京友谊医院、公安医院、解放军二六二医院、二九二医院和北京朝阳医院的医生护士表达我深深的谢意！我父亲在八年间展转于以上各医院，没有一个统一的病历，增加了他们治疗工作的困难。他们中的许多人对我父亲的境遇抱着深切的同情，在医疗护理上对我父亲关怀备至，使他虽长期处于逆境之中却仍以高龄辞世。尤其是公安医院严大夫以及朝阳医院陈大夫、徐大夫、骆大夫，他们高尚的医德，我永志不忘。

□ 原载《开放》（3 / 17 / 2005）

~~~~~

【历史沉思】

重新审视陈伯达

• 金 钟 •

陈晓农新著对中共大秀才陈伯达的一生，提供许多可信的资料与看法，足以供人思考陈伯达案的应有定性，并引出沉重的历史教训。

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那个口音不清的陈伯达曾是权势很大的第四号人物，他上面是毛、林彪、周恩来。陈是政治局常委，文革小组组长，是直接负责运动的领导人。文革之始，迄今近四十年，有关毛林周的传记、文艺作品不可胜数，有关江青四人帮和被打倒的刘、邓、陶的作品也不少，唯独对这位四号人物的作品甚为罕见，以专着而论，仅一本叶永烈经过官方审阅的《陈伯达传》，有关陈的记载分散在有关文革的各种文字中。即将出版的《陈伯达最后口述回忆》，由陈伯达之子陈晓农编撰，是弥补对陈伯达研究之不足的一本重要著作。笔者有幸看到书稿，先睹为快，在此谈一点观感。

◇ 激进知识份子卷入红朝的典型

陈伯达（一九〇四——一九八九），福建泉州人，在中共高层习惯称他“老夫子”。他在国共分裂的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共，同年赴莫斯科中山大学就读，三年后回国，做党的宣传工作，编杂志，写文章，同时研究文史问题，在北京中国大学任教，并发动一场有全国影响的“新启蒙运动”。一九三七年进入延安，一年后和毛交流古代哲学研究而成为毛的政治秘书。从此，在长达三十年期间，他作为毛的一枝笔，参与起草许多党的重要文件、决议、著作，毛的文章、讲话，也参与某些决策，直至一九七〇年庐山会议被毛弃如敝屣，点名打倒。

陈伯达与中共革命的关系，显示了一条知识份子的激进之路，他们投入革命以满足自己的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而革命正需要他们的智慧与论据，以鼓动民众，号召天下，最后，他们知识人的气质与理性多半导致和走向暴政与专制的革命发生分歧，以致被抛弃。中共早期的陈独秀、瞿秋白都是这样的人物，虽然他们对革命的反省和理论建树大大超过陈伯达。陈报入中共后的角色，容易令人想起明末农民暴动中李闯王的谋士李严（他编的歌谣“迎闯王，不纳粮”，助闯王打天下，最终被谗杀）。

回看中共，陈独秀分道扬镳，瞿秋白划为叛徒，陈伯达则是“国民党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一九八〇年被特别法庭以参加反革命集团罪、阴谋颠覆政府罪、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判处十八年徒刑。一九八一年保外就医，一九八九年病逝。和赵紫阳一样，活了八十五岁，但明显不同的是，他保外期间仍不断写作，包括哲学、文史评论，甚至有经济论文。叶永烈曾多次访问过陈伯达，九八年的修订新版陈传还得到陈晓农许多帮助。那么，今天陈晓农再出这本口述回忆录，必然有叶传的许多未尽或歧异之处。我看差别在于，晓农新著更着重在澄清辩正事实方面，因为陈伯达最后八年，仍处于与外界隔离状态，其子晓农是朝夕陪伴照料他生活的唯一的子女（陈之长子一九六〇年因与毛女李敏相爱失恋而自杀死），晓农记录了许多与父亲的谈话，成为本书的资料来源。

◇ 侍君忠君为君宠：在毛刘之间

晓农以其父一九二五年一篇小说的一段话作为陈伯达一生坎坷的写照：“我现在正如那每次都打败了仗的久经战阵的兵士，遍身负着伤痕，倒卧在暮色苍凉的草野里，望着西山的残阳在苟延残喘。”悲怜之情，溢于言表。

陈伯达继承中国士大夫阶级的忠君传。是一位博通古今的学者，岂能对毛之独裁暴政没有反感？但“士为知己者死”的信念主导一切，至晚年，他犹对儿子说，毛主席老了，思维不正常了，你们不要记恨他。他给过我很大的帮助。还说“君子交绝，不出恶声”。陈在林彪叛逃当日被抓小鸡式地送进秦城监狱，入牢房高叫“我救过毛主席一命！”此话传上去，他的狱中待遇得到改善，关入三楼，“伙食比外面还好”。救毛之事发生在一九四八年蒋机轰炸阜平时。一九七三年中共十大陈被开除党籍，他坐在牢房地板上，边哭边诉：“哪有这样的叛徒特务呀，自己冒着飞机轰炸的危险去救毛主席！”毛死，他在监狱中“哭了几天”。

毛对陈的宠信，在中共阵营的知识份子中，无出其右。毛的七大报告，两次赴苏顾问、共同纲领宪法草案、八大报告、批苏共二十大文章、毛论十大关系、国际共运二十五条、七千人大会刘少奇报告、文革十六条……都出自陈的手笔，一名读书人受主恩宠至此，中国历史上也少见。秀才一只笔能驾御万民，影响全党全国，自然也是一种权力，一种大权。

书中描述陈伯达对毛刘矛盾的看法与介入，有独到之处。他说，毛刘分歧在四清问题上恶化，不是刘否认阶级斗争，而是刘认为问题在基层，在下面，毛则认为在党内，在当权派。在毛刘之争中，陈竟可以施加影响，缓和双方关系。他主动向毛建议由刘总管四清，为毛采纳，即找

刘谈话。陈说，刘在外面形象温和，实则做事武断，不好商量，脾气和毛差不多。六五年一月发生过一件刘得罪毛的事。在中央会议上，毛刚发言不久，就被刘打断插话，而且，一路说下去，视毛为无物。毛第二天开会，就举着党章说党员有发言权，暗指刘不许他发言。后来，毛对斯诺说，那次会议后，他决定刘要下台。

◇ 与阶级斗争对立的唯生产力论

陈伯达说，那次会后，毛要他起草二十三条，他感到毛对刘有“很大意见”，心里不安，便找了王力、彭真、陶铸去和刘谈，盼刘向毛做检讨。为调和毛刘关系，他“做过几次努力”，毛周都很清楚。毛后来批评他在毛刘之间“搞投机”即指此。陈回答晓农问说：刘上台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不肯定，但肯定会实现中苏和好。即刘不会反修，这显然是毛刘的重大分歧。陈说，刘对大跃进也下过不少错误指示。六二年至六五年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路线形成，毛有主要责任，其他人也有责任，他本人也接受这条路线，帮毛刘记录一些指示，但这条贯穿九大、至十一大的路线的“最重要的文字表达”——毛在八届十中全会上关于“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一段话，却是王力而不是陈伯达整理的。十大更批陈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

陈伯达在毛时代政治路线上值得肯定的是，作为他的主要罪状的鼓吹“唯生产力论”：起草一九五六年中共八大政治报告决议中，提出对国内主要矛盾的表述：“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但会后毛表示异议，认为国内矛盾实质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时至今日，八大路线已受到党内外高度评价，认为毛如果遵循八大路线不会搞出一个文革来。

一九六五年起草《工业问题》文件，主张“电子为中心”发展工业，毛当时还相当赞许、高兴，破例地单独请陈吃饭。但遭到邓小平反对，说搞太多新技术，不合适，要以钢为纲，大家无言，文件被否定。陈为此而伤心说，如果采纳他当年的思想，中国经济也不会耽误那么多年。

起草一九六九年九大报告时，陈提出以后要以搞好生产提高生产率为主要任务，又批评过张春桥、姚文元起草的报告是伯恩斯坦观点“运动就是一切，目的是没有的”。被毛派所拒绝，斥为“唯生产力论”、“修正主义”。毛对陈的草稿，原封不动退回，还说陈是“船要沉了，老鼠搬家”，指陈要背叛他，不搞运动，要搞生产了。说陈本性难改，总是看重经济，“帝国主义本性不改，陈伯达本性也不改。”

陈在毛独裁时代，作为御用文胆，无疑也是帮凶一名，但以上这些纪录也反映了以理性为特征的现代知识人必然和专制权力不完全适应而发生分歧。

◇ 对周恩来、江青、陆定一的回忆

陈晓农这本书包含一些陈伯达透露的少见的高层内幕。例如：

为周恩来说情。如前述陈伯达调和过毛刘关系，也为毛周关系解过套。文革初期，一天，邓颖超突来拜访陈伯达夫人刘叔宴，原来周恩来受了毛的重话批评，心情低落已影响日常工作，邓盼陈可以居中调和，陈则多次在毛面前为周缓颊，使周摆脱困境。文革后邓颖超亦投桃报李，应陈要求为陈妻平反，调中办离休。虽然她已与陈离婚，双方终未破镜重圆。

与江青关系。陈在庐山会议前曾与周恩来谈到江青对毛不忠实，她三次对陈说要离开毛，

第一次在延安枣园；第二次在西柏坡，江说要离开毛去别的地方；第三次在北京西山，解放后。周说第三次，他知道，是毛要周把她送到莫斯科去的。有一次江来到陈办公室，看到书架上有宋庆龄文集，抽出来就往地板上摔。又一次开会，江辱骂陈攻击李希凡，随即叫李出来，二人抱头大哭，把玻璃杯摔碎在陈脚下，陈只得去拾起一地的碎片。

陆定一文革前很左。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上周恩来陈毅给知识份子摘资产阶级帽子，毛无异议，但后无下文，原来党内有人反对。中宣部长陆定一说知识份子没甚么变化，不能摘帽，和周恩来激烈争执。最后，毛接受陆的观点，六四年并由陆出任文化部长代替茅盾。不过好景不长，六五年陆因夫人严慰冰匿名信反林彪事件而株连撤职，六六年文革前更被打成反党集团。据说文革后，陆是坚决主张批毛的，他文革前的左史，便为尊者讳了。晓农指出，陆在六四年底中央会议上讲文化革命，“说文化部全烂掉了，是资产阶级封建阶级联合专政”，对毛发动文化大革命有重要影响。

◇ 反右运动与庐山会议角色

陈伯达反右运动表现如何？晓农书引证父亲谈话与资料，首先，五七年二月，毛作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与陈致毛一信有关，而发表的讲话也是陈整理成文的（记得文革中，笔者看过该讲话的记录稿，与正式发表稿区别甚大）。文中陈伯达原加有“大规模群众性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之句，后改为偏左的提法，是毛接受陈正人的意见而定的。反右期间，陈伯达没有写一篇文章，而胡乔木为人民日报写了多篇反右社论。毛曾派陈去北大看大字报，陈看后报告说“不值得大惊小怪，没甚么不得了。”当时，邓小平主持一次省市书记会议说“现在时间比金子还宝贵，要书记们赶快回去收集右派言论，否则晚了，收集不到了。”陈听到“很惊讶”，他认为，人总会说错话的，这样收集，牵涉太多，“反右搞得那样扩大化，邓小平同志有很大责任。”

当年九月，邓在三中全会作整风反右报告，把知识份子和资产阶级放在一起打击，该文没有收进《邓小平文选》（官方许多出版物完全不提邓反右的角色）。晓农书中透露，邓的高升与陈伯达不无关系。反高岗斗争后，为团结西北同志，毛向陈谈到谁接替高岗的问题，陈伯达说邓小平有一篇讲群众路线的文章写得不错，也在西北工作过，也有功劳，可以团结西北同志。不久，中央就调邓为中央秘书长。邓到中央后，陈又对推荐邓有些后悔，觉得邓架子大，很不易商量问题。

五九年庐山会议因彭德怀一封写给毛的信，而打了一个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陈伯达也在山上。批彭之前，他在毛那里看过彭的信，并当毛面，赞扬信写得不错，问毛是否彭自己写的？毛说是的，“他能写”。不料几天后批彭开始，陈伯达也被扣上右倾帽子。陈做检讨，并不准参加会议，最后毛表示几个秀才还要用，陈得以赦免。会后刘少奇找陈谈话，把陈都说哭了。后又由彭真出面要陈写文章批彭德怀。陈便在毛的威望和压力下“要甚么给甚么”，写了批彭文章。但陈说文章完全是按中央领导要求写的，并经毛亲笔修改。

晓农书中对若干党史著作提出异议。如李锐的《庐山会议实录》说会议紧张时“这位老夫子躺倒装病，不参加会议”等，而高文谦著《晚年周恩来》和叶永烈的《陈伯达传》中对陈与林彪关系的描述都有失实之处。

◇ 对陈伯达应予重新评价

综上所述，陈伯达虽长期为毛所用，在毛的政治路线中，尤其是粉饰其独裁本质上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他在晚年也承认文革“是一个疯狂的年代，那时我是一个发疯的人。”“愚蠢至极，

负罪很多。”但是，他和那些元凶还有区别，他不像林彪、江青那样野心夺权，也不像康生那样以整人为职志，作为笔杆子也没有像姚文元那样凶恶。他是一个依附于皇上的高级幕僚、亲信与理论家，他不带兵，不涉特情，没有派系。他在一九四九年之后的一系列重要决策上和那条极左的暴力路线屡屡发生分歧，虽然，他在极力适应那条路线，并保持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但他更主要的角色还是党国体系的一个工具，一个企图使该系统较为协调和理性却终告失败的工具。

陈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本色在暴烈草莽的中共高层混了几十年，也未脱尽，一九六七年二月，毛恣意打倒陶铸后，遭到老干部不满而嫁祸于左右，在会上严斥陈伯达、江青。陈受不了，意欲自杀，被王力劝阻。陈回答说，他查了书，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是自杀死的，列宁还纪念他，证明共产主义者可以自杀——自杀还要先查理论依据，可谓天下奇闻。

因此，如果在毛的暴政中参与更重要决策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能够获得历史的宽恕，并戴上某种光环，那么，我们在接受这本最后陈述之后，应该给予陈伯达一个公正的重新评价，至少可以推倒“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可笑结论。

陈伯达说：“我的一生是一个悲剧。”这可以解读为一名有理想的书生，把他的智慧献给了制造中国一场浩劫而身败名裂。颇具文人气质的瞿秋白，一九三五年为革命而牺牲前写下沉重自白，认为参加共产党是一场“历史的误会”，是一场“滑稽剧”。相信陈伯达读过这位先知者的遗书，但两年后，他奔赴延安，五十年后才恍悟到是一场悲剧。这是二十世纪给中国知识界留下的一个教训。

□ 二〇〇五年二月二十五日（《开放杂志》2005年三月号）

~~~~~

## 【史海钩沉】

### 《红十条》的模糊语言与造反派的互相攻击

• 欧阳龙门 •

《红十条》是指1967年5月7日发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因为该决定共有十条内容，所以称为《红十条》（见附录）。《红十条》的第5条中有这样的一段话：

要帮组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出人意外的是这段话不仅没有使得两派“加强团结”，“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反而使两派“互相攻击”。有趣的是：两派在“互相攻击”的时候，都以这段话为依据，都利用了“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这句话的语言模糊性，对“这样的”三个字作了有利于自己的解释，得出结论认为：“革命的大联合”应该以自己这一派为核心。

在描述两种不同的解释之前，让我们先来介绍一下当时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广义的语言环境。

在《红十条》下达之前，成都和四川其他许多地方的群众组织分为三派：一是以“成都产

业工人战斗军”为核心的“产业军”保守派；二是以“红卫兵成都部队”为首的“红成派”；三是以“川大八二六”和“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为主的“八二六派”。

“红成派”和“八二六派”都是造反派，起初“川大八二六”只是“红卫兵成都部队”的一个支队。后来“川大八二六”攻击“红卫兵成都部队”总部的造反不够坚决，不够彻底，是“右倾机会主义”，所以分裂出来自成一派。而“红成派”则攻击“川大八二六”是“极左”、是“分裂主义”。

在1967年初的“一月风暴”夺权过程中，“八二六派”把矛头指向成都军区，因而在后来的“二月镇反”运动中被打成“反革命”，遭到严厉镇压，大量的成员被抓进监狱。作为学生组织的“红卫兵成都部队”没有卷入与成都军区的对立，所以没有遭到镇压，但是同属于“红成派”的一些工人组织还是被当成“反革命组织”被取缔。

成都军区原本打算在镇压了造反派之后，以“产业军”为主体，以“红卫兵成都部队”为团结对象实现“大联合”、“三结合”，然而1967年4月的中央军委命令（《军委十条》）、《人民日报》的社论《正确对待革命小将》、以及《中共中央处理安徽问题的决定》使局面发生了逆转。被抓进监狱的造反派成员获得了释放，受到镇压和打击的造反派开始恢复发展。

这时，由于还存在共同的敌人，“八二六派”和“红成派”的矛盾暂时被掩盖起来，两派合力向“产业军”发起进攻，武斗不断，直到1967年5月6日发生了流血事件，5月7日《红十条》下达。

《红十条》的下达使保守派的“产业军”很快土崩瓦解。按照中央的意图，“八二六派”和“红成派”应该能够迅速联合起来，实现“大联合”、“三结合”。因为：以李井泉为首的“走资派”已经被打倒（第1条）；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组织已经平反（第2条）；成都军区的领导班子已经改组，中央也指定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第3条）。按说道路已经铺平，障碍都已经扫清，成立革命委员会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然而《红十条》出来还不到一个月，“八二六”和“红成派”却闹开了。两派都认为应该以自己这一派为核心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两派都以《红十条》为根据，都引用了上述的这段话。

“八二六派”的解释是：《红十条》之所以说“这样的”革命组织，是因为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革命最坚决、造反最彻底，受到了“走资派”的打击和镇压，被打成过“反革命”。因此要以我们为核心来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和“三结合”。《红十条》说：“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这就是讲明了要以我们为核心，来团结你们。你们只是团结的对象，我们才是要注意团结别人的核心。

“红成派”的解释是：《红十条》之所以说“这样的”革命组织，是因为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革命在过去的革命造反过程中，经常攻击“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破坏团结，造成分裂，“转移了斗争目标”。因此，《红十条》要特别提醒“这样的”组织，“注意团结”，不要再犯错误。“这样的”犯过错误的组织当然不能成为核心。

两派又互相攻击发展到武斗，武斗又从棍棒发展到枪炮、坦克，整整斗了一年，一直斗到1968年5月，才以军队为核心组成了“四川省革命委员会”，当然两派中那一派也没有当上“核心”。

◇ 附录：中共中央关于处理四川问题的决定

一、以李井泉为首的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长期以来，把四川省当做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独立王国。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李井泉等人坚持执行刘少奇、邓小平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中共中央决定撤销李井泉的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的职务，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撤销李井泉的成都军区第一政委的职务。

二、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成都军区在反对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顽固追随者黄新亭、郭林祥的斗争中表现是好的。成都军区在支援地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特别是在支工、支农方面，是有成绩的。但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从二月下旬以来，支持为一些保守分子所蒙蔽、被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背后操纵的保守组织，把革命群众组织“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和“川大八·二六战斗团”等，打成了反革命组织，大量逮捕革命群众。他们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变成了“镇压反革命运动”。同时，擅自调动部队到宜宾，支持宜宾军分区、支持宜宾地委内一小撮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革命群众组织和革命群众，实行大逮捕。在万县军分区，还制造了武装镇压群众的流血惨案。在其他一些军分区和地委，也或轻或重地犯了这样的错误。成都军区个别负责人在支左工作中，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经中央指出后，成都军区就很快地开始进行改正。五十四军的领导同志，及时作了检讨，行动上也改得快。毛主席在四川的一个文件批语中指出：“犯错误是难免的，只要认真改了，就好了。四川捉人太多，把大量群众组织宣布为反动组织，这些是错了，但他们改正也快。”

三、由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成都军区政委张国华同志、司令员梁兴初同志和前宜宾地委书记刘结挺同志、前宜宾市委书记张西挺同志负责组织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以张国华同志为组长，梁兴初、刘结挺同志为副组长。筹备小组的成员，应该吸收革命群众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军队及其他适当的负责人和经过革命群众同意的地方上的革命领导干部参加。

四、宜宾地区由王茂聚、郭林川同志负责组织宜宾地区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在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领导下进行工作。其他专区和省属市或者成立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或者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由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讨论决定，报请中央批准。各专区和省属市的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的成员，按第三条规定的原则处理。

五、四川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要对四川全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组织、革命群众和革命干部进行妥善处理，一律平反，一律释放，并且依靠其中坚定的左派作为骨干，搞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死难的革命群众、革命干部，要进行抚恤。对确有证据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另案处理。要帮组革命群众组织恢复和发展，川大八二六和工人造反兵团这样的革命组织，要注意同红卫兵成都部队及其他革命组织加强团结，不要互相攻击，而转移了斗争目标。各革命组织，都要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整顿思想，整顿作风，整顿组织，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实现革命的大联合，实行革命的“三结合”。

六、要响应毛主席号召，大力进行拥军爱民，向军队和群众双方都进行正面教育，加强军民团结，严防坏人调拨军民关系。伟大的人民解放军一定会得到广大群众拥护的。要向全体指战员和广大革命群众宣传毛主席关于相信和依靠群众，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相信和依靠干部大多数的指示。

七、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指向四川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井泉及其一小撮同伙。在四川省军队内部，在干部和群众中，要对刘、邓、李等人进行充分的揭露和批判。这个批判，要同处理当前的问题和筹备革命的“三结合”临时权力机构统一起来。

八、广泛宣传中央军委的八条命令和十条命令，中共中央关于安徽问题的决定和批语。这

些文件中规定的原则，要严格执行。

九、对为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操纵的保守组织主要是进行政治思想工作，使其中的广大群众觉悟起来自己造反，同个别的坏头头和背后操纵他们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决裂，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划清界限，回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来。要教育受过压制的革命群众组织，按党的政策办事，不要对保守组织的群众进行打击报复，而要对他们进行说服教育，把他们也看做反动路线的受害者。一切群众组织，都只许文斗，不许武斗，不许打、砸、抢、抄、抓。煽动武斗的坏人，必须追究。

十、关于五月六日成都发生流血事件，中央将作为专案处理。对于枪杀群众的凶手，特别是事件的策划者要，依法处理。一切群众组织的枪支弹药，都一律由成都军区负责收回封存。对各群众组织中受伤的人，由成都军区负责安排治疗，对死者要进行抚恤。

中共中央

一九六七年五月七日

---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丁凯文、华新民（美国）思语（美国）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邮箱：hxwz@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hxwz-info@cnd.org 英文文件：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WWW）地址：<http://www.cnd.org/>

---